

资产专用性的度量研究

胡浩志^{1,2} 吴梦娇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3;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资产专用性是区分各种交易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使交易成本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最重要特点,它对公司融资结构、治理机制、纵向一体化、公司绩效和雇佣关系等方面有着非常强的解释力,因此对资产专用性的准确度量也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根据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的6个分类,梳理了有关的实证研究文献,对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进行了综述。研究分析表明,每一种类别的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都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度量方法,学者们为了得到理想的数据有时不得不牺牲度量方法的准确性;现阶段制约资产专用性实证研究的最大障碍来源于数据的可得性,因此若能获得翔实可靠的研究数据,将会大大地促进资产专用性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经济学;人力资本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品牌资产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3)01-0038-09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资产专用性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于特殊雇员的讨论,“……有了这些知识……如果他辞职,企业的损失额可能比付给他的工资还高,而他本人另谋职业的薪水可能不及原薪水的一半。”^{[1](P626—627)}贝克尔在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理论分析时明确阐述了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重要性^[2]。Polanyi在解释工艺技术时谈到经验丰富的工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3](P46—47)}。而后 Marschak 也认识到资产独一无二的特性^[4]。资产专用性的初始概念是由克莱因等提出的,它指只有当某种资产和某项特殊的用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资产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它的价值就不能完全体现出来,即有损失甚至完全丧失^[5]。直到威廉姆森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式确定了资产专用性的概念,把资产专用性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三个维度之一并对其作了不同类别的划分,人们才开始高度地关注和研究资产专用性及其对解释经济组织的作用。

事实上,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现实世界中,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及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资产专用性对各组织形式的区分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资产专用性的存在使学者们对因技术问题才导致纵向一体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实施纵向一体

收稿日期:2012-09-05

作者简介:胡浩志(1979—),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

吴梦娇(1989—),女,江西南昌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化的主要原因是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它节省了产业上下游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在已知不确定性的程度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的结合决定了合同关系的治理结构;对专用性资产的投资程度,即资产专用性的强度又会影响公司的融资结构;人力资本专用性是影响员工工资、企业绩效等方面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资产专用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资产专用性的研究也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人口、法律等各个方面。然而,对资产专用性以及由其引申而来的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资产专用性的度量问题,量化资产专用性不仅能使资产专用性的实证研究向前迈进一大步,使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步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范畴,而且能拓宽资产专用性的研究领域,使交易成本经济学得以迅猛发展。

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定义为:“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6](P51)}也就是说,当某项资产投入某种用途之后,把它转向另一种用途或由他人重新调配使用时它的价值会有损失,则该资产为专用性资产,该损失越大,资产专用性的程度越高。遗憾的是,威廉姆森并没有提出量化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指标,只是简单地用 k 代表资产专用性程度来分析问题。因此,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根据资产专用性的特性选择不同的资产专用性量化指标。但是到目前为止,综合描述这些量化指标的文献非常少见,以至于在实证分析中对资产专用性的衡量方法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这不得不说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大障碍。本文正是基于此而对资产专用性的度量展开研究,以期对资产专用性的深入研究提供度量方法上的参考。

本文的行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基于资产专用性的不同类别,根据目前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实证分析文献,对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进行综述;第三部分对综述的内容进行简要评论;第四部分为结语。

二、不同类别资产专用性的度量

由于专用性资产具有异质性、黏着性、稀缺性的特质,这使得测量专用性资产变得复杂。同时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研究人员对资产专用性的理解也是有所差别的,这意味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也不尽相同。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六类:人力资产专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实物资产专用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场地专用性(site specificity)、品牌资本(品牌资产专用性,brand asset specificity);奉献性资产专用性(特定用途资产专用性,devoted assets specificity)以及暂时性专用资产^{①[6](P113—114)}。本文将按照威廉姆森的分类方法,对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一) 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度量

人力资本专用性对企业绩效、员工工资、人才流动、社会福利、就业等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是资产专用性类别里研究非常多的一个。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一般来说,现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有两种,即时间配置型和“干中学”型。时间配置型是与生产性活动分离的主动投资,它涉及专用性人力资本形成的在职培训、离职培训、学校教育等途径;“干中学”型是与生产型活动相统一的被动投资,涉及在职学习和学徒培训等方式^{[7](P10—14)}。人力资本专用性较为常见的度量方法也是围绕这两种积累方式展开^②。

(1) 以任期时间作为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度量方法。Wang 等人在研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企业业绩的关系时指出人力资本专用性受长期雇佣关系的影响^[8],因此,任期时间能够较好地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Hitt 和 Bieman 等人就是将企业任期作为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发现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企业业绩正相关^[9]。胡浩志在研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和企业资本结构时,均以总经理的任期作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呈 U 型关系^[10],与企业资本结构呈倒 U 型关系^[11]。采用同样方法来衡量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学者还有 Parsons、Topel、Weisberg、Barth、Stevens、Menezes-Filho 和 Sullivan 等。

(2)以在职培训时间作为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度量方法。Davis-Blake 和 Uzzi 在研究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时,用三类企业专用培训时间的总和作为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这三类专用培训分别是企业提供的正式培训、企业管理者提供的非正式培训以及同事所提供的非正式培训^[12]。同样采用该方法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学者还有 Booth 和 Chatterji、Bessen、Miyamoto 和 Shirai、Garloff 和 Kuckulenz、Konings 等。

(3)同时采用任期和在职培训时间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李晓霞在研究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就业流动时,用任期、培训或技能表示人力资本专用性,但由于技能无法具体描述,所以以与个人行业经验联系最为密切的技术职称和职务层级作为行业经验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射指标,因此,她最终采用培训、任期、技术职称、职务层级四个变量来衡量人力资本专用性^[13]。胡浩志和卢现祥在研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员工工资和员工流动性时,分别用企业任期和在职培训时间作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工资水平显著正相关^[14],与员工流动性显著负相关^[15]。

(4)兼顾时间配置型和“干中学”型两种方式综合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Chandler 等人在研究资产专用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对销售与雇员增长关系的作用时,利用四个指标来观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一是产品专用知识(product specific knowledge),指为获得关于产品、服务知识和专门技术所必须做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用新员工掌握必要的产品知识所付出的时间、支出来衡量;二是企业专用知识(firm specific knowledge),用培训新员工的投资来衡量;三是优秀个性化服务的重要性(important of excellent personalized service),指客户与员工之间的联系程度;四是拥有专利信息的必要性(necessity of maintaining proprietary information)。作者为每个指标都设计了不同的为获得相关知识所需的时间、精力等问题的调查问卷,通过 Likert 的五级量表的形式来考察^[16]。

2. 通过调查问卷形式,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设计不同的问题从而对资产专用性程度进行度量。Rayton 和 Brammer 在研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签约问题时,采用了欧洲版的 Watson Wyatt 人力资本指数调查数据(Watson Wyatt human capital index employer survey),并以问卷调查中两个问题的回答的赋值数据作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测度。这两个问题是“雇佣新的专业人员不需要额外的培训便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雇佣新的小时工不需要额外的培训便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对其答案“强烈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以及“强烈不同意”分别赋值 0~4,因此数值越高表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17]。同样采用问卷调查并对答案进行赋值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学者还有 Kaarsemaker。国内学者程德俊等人在研究高参与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关系时,以人力资本专用性作为中介变量,根据 Lepak Snell 开发的测量人力资源独特性的量表,设置了“难以在劳动市场上广泛获取”、“非常难以取代”、“竞争对手难以获得”、“被认为是行业中最好的”、“对贵公司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对竞争对手而言,难以模仿和复制”、“满足贵公司特定的需要”、“构筑起公司和竞争对手的差异”等问题,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作为人力资本专用性的观察变量,通过向中高层领导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研究,证实了高参与工作系统形成的人力资本专用性减少了员工流动性,在学习曲线的作用下可以提高企业绩效的假设^[18]。

3. 通过考察工作流动性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Zahariadis 认为人力资产专用性本质上是指个人跨行业流动的能力,工作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退出而非进入一个行业,因此作者有别于传统方法,采用净就业(失业)与总工作之比(net job creation (loss) as a percent of total jobs)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这个指标值越高,说明越容易退出,工作流动性越高,因而人力资本专用性越低^[19]。Davis 和 Haltiwanger 在研究就业及其影响后果时,使用工作流动性来衡量人力资本专用性,其度量指标为年就业量与年失业量之和与总工作量之比(annual gross increase plus annual gross decrease in jobs divided by total job)^[20]。

4. 以有形资产的专用性(tangible firm-specificity)来衡量人力资本的专用性。Robinson、Wilson 和 Zhang 在研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雇员所有权时,采用了有形资产的专用性来度量企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作者认为它们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有形资产的专用性主要包括:产品

生产线是否定做;产品是否存在异质性;产品是否具有独特工艺性;产品生产中非批量性的工作所占的比重等^[21]。

5. 以企业专用知识(firm-specific knowledge)来衡量人力资本的专用性。Wang、He 和 Mahoney 在研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以企业专用性知识作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并以企业的专利引用量作为企业专用性知识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且这种相关关系受到雇员股权和长期雇佣关系的影响^[8]。

6. 专家打分法。Slaughter、Ang 和 Boh 在研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员工的报酬任期曲线之间的关系时,通过 15 位专家对每种工作的性质进行打分评级的方法来确定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程度,如该种工作是否需要独一无二的技能,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的培训以及是否需要大量的企业专用性知识、技能等^[22]。采用同样方法的学者还有 Griffith 和 Lusch。

7. 技能权重法。Lazear 创立了一个新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即技能权重观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专用性技能是由一系列通用性技能组合而成,其专用性体现在特殊的技能权重上,也就是说,各种一般技能的不同权重导致了技能的专用性,也即人力资本的专用性。Backes-Gellner、Mure 以及 Ginther、Rassier 等均通过实证方法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23]。而 Leping 则以该理论为基础,利用了爱沙尼亚的工作职业数据库,测量了高级经理、服务业的工人、渔民、职员、机器操作工等 9 个职业的专用性程度^[2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过任期时间和在职培训时间的长短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是学者们采用最多的两种方法。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数据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至于通过设置不同的问题,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通常会用到五级量表的形式来量化,五级量表分了五个等级的同意程度,结合被回答者的主观感受来得到数据,这种测度方法还是比较模糊和不准确的。而通过考察工作的流动性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则常常会因为数据的可得性而受到阻挠,因而不得不通过降低指标的准确性来获得数据。至于后面的几种测度方法也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能够直接测量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发现,不管上面的哪一种测量方法,都是一种近似的替代方法,因此,尽快找到一种合适的准确的度量方法是学者们急需研究的方向之一。

(二) 实物资产专用性的度量

实物资产专用性具有独特性和难以替代性的特征,最符合专用性的定义,因此,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多,其度量的方法也很多样。

1. 定义法。根据威廉姆森的定义,专用性资产在做他用时其价值相对于原来的资产价值会有所损失。Cushing 和 Mccarty 等根据这一定义,通过公司资产的清算价值和清算前价值的比例分布构建了一个资产专用性指数,即不同期限和性质的资产不同的退出价值率,以此来衡量资产专用性的程度。这个指数越高,表明资产专用性程度就越低^[25]。这种方法是根据资产专用性的概念推算出来的,比较准确。事实上除了国外学者,国内方面也有人采用这一方法,如李青原等在实证分析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关系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26]。但是,对于专用性资产的退出价值,往往是在公司被收购或破产、项目失败而退出等情况下通过市场才能得知,因此数据难以获得,且研究破产公司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对其他公司的价值影响意义不大,所以这种方法不被大多数人采用。

2. 长期(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法。学者们一般采用长期(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资产专用性程度。德姆塞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分析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的关系时,用企业固定资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来衡量资产专用性程度^{[27](P215—224)}。但是把长期(固定)资产当做专用性资产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失准确的,正如雷新途所指出的:判断资产专用性程度要看其是否产生了两种经济后果——是否增进了企业绩效;是否决定了企业的融资契约安排。长期(固定)资产变成专用性资产有一些条件,如代理问题不严重、不存在事后被敲竹杠问题、企业内部无机会主义等^[28]。因此,随后的学者们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进行了改进。Collis 和 Montgomery 在研究公司战略时采用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资产专用性程度^{[29](P143—147)}。程宏伟在研究隐形财务契约时,采用“固

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之和与企业总资产的比例”作为衡量物质资产专用性的指标^[30]。这种衡量方法相对来说要准确些,事实上很多学者也采用这种方法,如曾欣等在研究企业资产专用性强度是如何影响融资结构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得出了资产专用性程度与留存收益正相关,与股本比例负相关的结论^[31]。

3. 以研发费用和广告支出度量实物资产专用性。学者们一般认为物质资产专用性程度由研发程度决定,因此他们用公司研发费用和广告支出度量物质资产专用性。Zahariadis 利用 1990~1993 年 13 个欧盟国家的数据,用研发程度来度量物质资产专用性,研究发现,物质资产专用性对总体和区域补贴有显著的 U 型影响^[19]。Bradley、Jarrel 和 Kim 将公司广告与研发费用之和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作为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指标,实证研究发现,这个比值的十年平均数与杠杆率负相关,从而证明了最优资本结构的存在^[32]。Mocnik 也采用这一衡量方法,他对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其借款能力负相关^[33]。国内学者如钱春海等以研发费用和广告支出或耐久性投资对净销售的比率来衡量资产专用性,通过调查问卷,对资产专用性及其影响因素做多元回归分析,得出资产专用性与公司负债正相关的结论^[34]。

4. 根据实物资产的价值来衡量资产专用性程度大小。李孔岳基于广东省的调查问卷,通过 4 个观察项来考察实物资产的专用性——农户拥有的抽水机、拖拉机、耕整机、运货车的数量。对这四个因子进行检验后确定了 3 个考察项适合作因子分析——农户拥有的抽水机、拖拉机和运货车的数量,并以此作为资产专用性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实物资产专用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有限,而农户行为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显著^[35]。

5. 问卷调查法。Monteverde 和 Teece 最早系统地用经验方法检验资产专用性对纵向一体化的决定作用,他们以福特、通用为例,从内部(纵向)一体化生产还是市场生产汽车元件的角度比较中,将应用工程的努力(application engineering effort)作为衡量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指标,通过一个关于元件是否是专用的、在多大程度上专用、是否标准化等问题的调查问卷,以得出的元件的专用性排名指数组反映资产专用性程度。他们认为应用工程的努力程度越高,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越容易导致纵向一体化^[36]。Anderson 和 Schmittlein 利用这个调查问卷得出的指数作为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替代变量,采用电子元件行业发展的数据,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越可能导致纵向一体化^[37]。

6. 其他方法。袁琳等以 2001~2003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值以及销售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这两项指标来代表资产专用性,得出资产负债率与资产专用性成正比的结论^[38]。贺翔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资产专用性程度,研究发现钢铁行业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电力行业无明显相关关系^[39]。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有关实物资产专用性的衡量方法,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各自只采用一两个指标,其有效性难以考究。精准的指标由于在数据上和应用上的问题难以被多数人采用,可见,全面而准确的数据是资产专用性度量的关键所在。另外,度量实物资产专用性的方法比较多样,因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而采用不同的指标,这些指标各有优缺点并且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有关实物资产专用性的衡量方法将会形成一致的看法。

(三) 场地专用性的度量

场地专用性的度量是指为节约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而被排列的相互密切联系的一系列站点,多用地理位置的安排来衡量。对于这个方面的度量,实证研究文献比较少。李青原在研究资产专用性与公司纵向并购的财富效应时,将地点相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作为资产专用性的替代变量,通过半正矢函数公式(haversine)计算收购公司(i)和目标公司(j)的距离 $d_{ij} = R \times 2 \times \arcsin[\min(1, \sqrt{a})]$ 。其中 $a = [\sin(dlat/2)]^2 + \cos(lat_i) \times \cos(lat_j) \times [\sin(dlon/2)]^2$, R 是地球半径 6 378 km, lon_i 和 lat_i 分别为收购公司办公地址的经度和纬度, lon_j 和 lat_j 分别为目标公司办公地址的经度和纬度, $dlon$ 和 $dlat$ 分别为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地址的经度和纬度之差。若 d_{ij} 小于 100 km,则视为本地交易,说明场地专用性较强,若大于 100 km,则场地专用性较弱。他利用该指标对资产专用性与公司纵

向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并购双方资产专用性越高,收购方公司财富效应越大^[40]。李孔岳在研究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对土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影响时,通过4个观察项来考察场地专用性——村庄距中心镇的距离、村庄距汽车站的距离、村庄距火车站的距离、村通公路里程数。对这4因子进行检验后确定了2个考察项适合作因子分析——村庄距中心镇的距离、村庄距汽车站的距离,并以此作为场地专用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场地专用性对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影响不显著^[35]。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场地专用性的衡量方法比较单一,这与其定义有关,而接近定义的方法也是比较精准且有效的方法。同时,我们注意到研究场地专用性的实证文献不多,这可能与场地专用性比较固定、专用性的程度变化不大有关。

(四) 品牌资产专用性的度量

对品牌资产专用性的度量,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 调查问卷法。对企业而言,对某品牌投入的时间和资本就是对品牌专用性资本所作的投资。Chiou 和 Shen 在研究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对客户网络忠诚度的影响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设置了“如果转向其他网络平台,我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明确服务需求、明白如何使用新平台、了解新平台”的问题,并以其回答结果作为品牌资产专用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客户对某一网络服务供应商投入的知识、技能、时间等品牌专用性资产越多,转向其他供应商的可能性就越小^[41]。

2. 无形资产占可支配净资产(公司利润)的比值。对企业而言,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Rosenberg 用购买支出费用与公允价值之差占可支配净资产的比作为衡量品牌专用性资产的大小,这里的差额就是企业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的价值^{[42](P152—153)}。Minkler 和 Park 在研究资产专用性与垂直一体化时,用公司品牌支出与公司利润之比作为品牌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指标,研究发现,在所有资产中,品牌专用性资产是与特许经营最相关的资产,品牌经营的特许人通过市场和广告策略的投入来增加品牌专用性资产,品牌资产专用性程度与垂直一体化正相关^[43]。

一般来说,学者们倾向把在品牌上的投资作为品牌专用性资产,因此对市场和广告的投入资本就是品牌专用性资产,以其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品牌专用性资本的密度。

(五) 特定用途资产专用性的度量

特定用途的专用性资产是为了专门的目的而进行的投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比较少。特定用途资产专用性的度量可以采用某一具体用途的投资支出来衡量,如对某一特定项目的投资,其资产专用性的度量就是这部分投资与总资产的比值。若该特定用途是无形的,则其度量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武志伟、陈莹在对关系专用性投资、关系质量与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用 Likert 五级量表来衡量关系专用性的程度,其中 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他们认为对普通关系专用性的投资是指合作成员为了使双方合作关系强化而进行的相关投资,对人情关系的投资则是为了维系私人合作的人际关系。特定用途的投资包括双方在土地、机械设备及其他实物方面的有形价值投资和双方在人力资本、技术等方面的无形价值投资。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普通关系专用性投资和人情关系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对合作绩效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44]。

(六) 暂时性资产专用的度量及其他

有关暂时性专用资产的文献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中还未发现,因此对它的度量方法无从考察。但是,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所研究的内容到底是何种资产的专用性,只是笼统地概括为资产专用性。如 Cavanaugh 在研究资产专用性和联合劳动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三个指标来度量资产专用性:一是企业价值的增值;二是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三是销售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45]。刘兴亚在研究资产专用性、文化差异对外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时,以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验以及跨国并购的经验来度量资产专用性,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的公司,越容易发生跨国并购行为,同时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对外资进入模式的

影响越大^[46]。

三、简要述评

通过以上的文献整理,我们可以看到,对资产专用性的度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方法,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学者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但是由于资产专用性本身的属性,使得对其的度量非常复杂,无论是方法的准确性还是数据的可得性等方面都需要认真考究。

1. 准确性。对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每个类别下比较接近定义的方法是比较准确的。如实物资产专用性,以清算前后价值的变化来衡量是比较准确的。其他度量方法也符合理论逻辑,如把研发费用与总资产的比例作为实物资产专用性的替代变量。但是企业进行研发,不排除其中含有创新的成分,这样的话,把所有的研发费用都当做实物资产专用性就缺乏准确性。再者,每项指标衡量的都是有形价值,那些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价值都没有涵盖,这就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找到更为准确的度量指标。

2. 数据可得性。从度量方法的发展历程来看,数据可得性起了关键作用。为了得到想要的数据有时不得不牺牲度量方法的准确性。威廉姆森提出的6类资产专用性中至少有3类,常常因为没有相关数据而不得不放弃,这也是为什么有关人力资本专用性和实物资产专用性的研究文献相对比较丰富的原因。研究数据既包括可度量的有形价值,也应该包括那些无形价值,但是有关无形价值方面的数据往往无法获得,比如企业专用性的知识和资源等。研究人员查找数据,要么通过官方渠道如统计年鉴上查找,要么就是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但是由于后者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因此其准确性有待检验。企业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使得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得性大大降低,这为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带来极大困难。

3. 多样性。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员惯用的做法,不管是清晰的分类还是概念上的度量,一个简单的类别如实物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就有很多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资产专用性度量的复杂性,这为资产专用性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四、结语

本文根据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的6个分类,梳理了有关的实证研究文献,对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简要评论。我们看到,每一种类别的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都是多种多样的,由此可见度量方法的复杂性。同时也注意到,资产专用性的度量在数据可得性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学者们在选择度量方法时,准确性和数据可得性两方面有时不可兼得。虽然学者们不断改进度量方法,但迄今为止还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背景、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目的的学者只能选择自己认为较为可行的方法进行度量。笔者认为,制约资产专用性实证研究的最大障碍来源于数据的可得性,因此,学者们在进一步完善资产专用性度量方法的同时,有关方面若能提供翔实可靠的研究数据,将无疑会大大地推动资产专用性的实证研究向前发展。

注释:

①威廉姆森在其早前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中,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四类,即人力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场地专用性、特定用途资产专用性。这里的“特定用途资产专用性”即对应于后来提出的“奉献性资产专用性”。

②孟大虎从技能的可转移性角度将专用性人力资本分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地域专用性人力资本等。本文不作此分类,只是笼统地称为专用性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2] Gary S. Beck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9—49.

- [3] 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4] Marschak, J. Economics of Inquiring, Communication, Deciding[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8, 58(2): 1—18.
- [5] 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Armen A.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8, 21(2): 297—326.
- [6] 威廉姆森. 治理机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7] 孟大虎. 专用性人力资本研究: 理论及中国的经验[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8] Heli C. Wang, Jinyu He, Joseph T. Mahoney. Firm-Specific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Roles of Economic and Relationship-based Employee Governance Mechanis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1): 1265—1285.
- [9] Michael A. Hitt, Leonard Bierman, Katsuhiko Shimizu, et al.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on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in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44(1): 13—28.
- [10] 胡浩志. 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0, (11): 38—46.
- [11] 胡浩志. 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企业资本结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 56—64.
- [12] Alison Davis-Blake, Brian Uzzi. Determinants of Employment Externalization: A Study of Temporary Workers and Independent Contractor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 38(2): 195—223.
- [13] 李晓霞. 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就业流动: 行业要素的检验[J]. 湖北社会科学, 2011, (9): 97—100.
- [14] 胡浩志, 卢现祥. 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员工工资——基于 CGSS 的实证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 126—132.
- [15] 胡浩志, 卢现祥. 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员工流动性——基于 CGSS 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0, (6): 86—92.
- [16] Gaylen N. Chandler, Alexander McKelvie. Asset Specificity and Behavioral Uncertainty as Moderators of the Sales Growth: Employment Growth Relationship in Emerging Ventur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 24(4): 373—387.
- [17] Bruce A. Rayton, Stephen J. Brammer. Contracting in the Presence of Specific Human Capital[Z].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6th Annual Meeting, 2002-09-27.
- [18] 程德俊, 赵曙明. 高参与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 人力资本专用性和环境动态性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06, (3): 86—90.
- [19] Nikolaos Zahariadis. Assets Specificity and State Subsid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1, 45(4): 603—616.
- [20] Steven J. Davis, John C. Haltiwanger, Scott Schuh.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M].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6.
- [21] Andrew Robinson, Nicholas Wilson, Hao Zhang. Employee Ownership and 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EB/OL]. (2002-07-04)[2012-08-10]. <http://ocean.st.usm.edu/~w300388/brussels/ROBIN.pdf>.
- [22] Sandra A. Slaughter, Soon Ang, Wai Fong Boh. 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nd Compensation Organizational Tenure Profiles: An Archival Analysis of Salary Data for IT Professional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7, 46(3): 373—394.
- [23] Edward P. Lazear. 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 Skill-Weights Approac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117(5): 914—940.
- [24] Kristjan-Olari Leping. Measuring the Specificity of Human Capital: A Skill-based Approach[Z]. TUTWPE No. 134, 2005.
- [25] W. W. Cushing Jr, D. E. McCarty. Asset Specific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Test[J]. Managerial Finance, 1996, 22(2): 16—18.
- [26] 李青原, 陈晓, 王永梅. 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金融研究, 2007, (4): 100—112.

[27] 哈罗德·德姆塞茨. 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组织[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28] 雷新途. 我国企业资产专用性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0, (1): 101—106.

[29] D. J. Collis, C. A. Montgomery. Corporate Strategy: Resources and the Scope of Firm[M]. The McGraw Hill Companies, 1997.

[30] 程宏伟. 隐形契约、专用性投资与资本结构[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 (8): 105—110.

[31] 曾欣, 应幸臻. 企业资产专用性强度是如何影响融资结构的——基于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中国商贸, 2009, (11): 90—91.

[32] Michael Bradley, George A. Jarrell, E. Han Kim. On the Existence of an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84, 39(3): 857—878.

[33] Dijana Mocnik. Asset Specificity and a Firm's Borrowing 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anufacturing Firm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1, 45 (1): 69—81.

[34] 钱春海, 贺旭光. 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融资决策[J]. 上海管理科学, 2002, (2): 46—48.

[35] 李孔岳. 农地专用性资产与交易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09, (3): 92—98.

[36] K. Monteverde, D. Teece. Supplier Switching Costs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13(1): 206—213.

[37] Erin Anderson, David Schmittlein. Integration of the Sales For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15(3): 385—395.

[38] 袁琳, 赵芳. 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相关性——基于上市公司 A 股市场的动态检验[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44—50.

[39] 贺翔. 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融资结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 云南大学, 2006.

[40] 李青原. 资产专用性与公司纵向并购财富效应: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 14(6): 116—127.

[41] Jyh-Shen Chiou, Chung-Chi Shen. The Effect of Satisfaction, Opportunism, and Asset Specificity on Consumers' Loyalty Intention toward Internet Portal Si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2006, 17(1): 7—22.

[42] Rosenberg, J. The Dictionar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M].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83.

[43] Alanxon P. Minkler, Timothy A. Park. Asset Specific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Franchising[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4, 9 (4): 409—423.

[44] 武志伟, 陈莹. 关系专用性投资、关系质量与合作绩效[J]. 预测, 2008, 27(5): 33—37.

[45] Joseph K. Cavanaugh. Asset-Specific Investment and Unionized Labor[J].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1998, 37(1): 35—50.

[46] 刘亚兴, 李湘宁, 缪仕国, 姜子叶. 资产专用性、文化差异与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交易成本框架的分析[J]. 金融研究, 2009, (3): 72—83.

(责任编辑:李效梅)